

第一章

緒論：方法、範圍與回顧

一、研究背景：從「希望」與「絕望」出發

晚清至三、四〇年代的文學主題非常紛陳，非一言能以蔽之。我欲觀察的是：構成書寫的動力是什麼？在這方面，「希望」與「絕望」的韻頡非常值得關注，也是這兩重力量的拉扯，讓晚清、五四乃至三〇年代交集出不同組曲，成為諸如譴責、理想、反傳統、無產階級等書寫，讓我們見識到小說如何強勢介入現實、政治、文化或是被現實、政治、文化等層面所介入。在此一介入與被介入的糾葛中，「希望」與「絕望」遂成強大的書寫動力。

本論文當然無法以學位論文的篇幅呈現如此龐大的論述場域，因此以類似「星際大戰」(Star Wars)的續集概念，¹集中於某個範疇與視角，以呈現更周詳綿密的論證。晚清小說的「烏托邦」視野是這一組曲的前曲，將與我此前的研究（如我已觀察過魯迅的「希望」與「絕望」的辯證²與晚清小說的「烏托邦」觀³）

¹ 《星際大戰》是美國導演喬治·盧卡斯 (George Lucas) 所製作拍攝的一系列科幻電影，1977年先拍出第四部曲《新希望》(A New Hope)，1980年拍出第五部曲《帝國大反擊》(The Empire Strikes Back)，1983年拍出第六部曲《絕地大反攻》(Return of the Jedi)，1999年拍第一部曲《威脅潛伏》(The Phantom Menace)，2002年拍第二部曲《複製人全面進攻》(Attack of the Clones)，2005年拍第三部曲《西斯大帝的復仇》(Revenge of the Sith)。

² 見顏健富，《論魯迅小說之國民性建構》(台大：碩士論文，2003)、〈「易屍還魂」的變調：論魯迅小說中的體格、精神與民族身分〉，《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5期(2006年11月)、〈一個國民，各自表述——論晚清小說與魯迅小說的國民想像〉，《漢學研究》第23卷第1期(2005年6月)等。

³ 顏健富，〈進出神仙島，想像烏托邦——論旅生《癡人說夢記》的空間想像〉，《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3期(2005年11月)。

及往後欲進行的研究（如巴金小說反映的「希望」與「絕望」）產生對話，以建構出近現代文學史的「希望—絕望」的評論視野。

無疑的，文學的虛實交錯在晚清此一交替的時代關口，充分表露，且淋漓盡致。歐陽健在研究晚清小說史精準指出：「晚清的最後十年，曾經被描寫成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然而，正是在這一時期裡，醞釀著由黑暗向光明的運動，萌發著對於美好未來的理想憧憬。滿懷激情地嚮往未來，期望中國早日實現民主和富強，是晚清新小說最普遍突出的主題。」⁴

當「黑暗」與「光明」、「希望」與「絕望」在小說裡各自表述時，預示了我們有關晚清「譴責小說」與「理想小說」的相互輝映。因此，當「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的譴責小說風靡晚清文壇時，⁵想像烏托邦的小說亦同時席捲而來，犀利悲觀與熱情樂觀的筆鋒，說明了「批判」與「讚頌」乃是晚清文人想像時局的兩種大相逕庭的方法。這種極端的「黑暗—光明」的修辭正好反映了「改革」的衝動，出現各種新舊、東西價值方案，間中激烈碰撞，寫出了極為繁複且精彩的一頁。

可惜的是：在文學史家的選擇性操作下，晚清小說中的烏托邦視野長期被淹沒。相對於譴責小說，評論界對於此類小說的論述顯得微不足道，難以建立晚清整體性的「希望之曲」。這些高度政治化的天馬行空的書寫，在往後百年的評論版圖上，卻像一群漂浮的幽靈，隱約迴盪。當然有更多小說因其本身的美學、內涵無法經歷起「典律化」的機制，銷聲匿跡於當代的接受視野。可是，若放在文化研究的脈絡下，這些曾演義多少空間想像的具有烏托邦視野的小說，不可輕易錯過。為何作家反覆推動此一理想空間？對於美好光明的嚮往如何在存亡之際被收編成一種應付時代危機的策略呢？為何這些曾經一再出入於晚清書寫的小說卻在往後的評論中被遮掩呢？無論是從美學藝術、思想領域、政治範疇等來思考，皆有可進一步拓展的深沈意義。

⁴ 歐陽健，《晚清小說史》（杭州：浙江出版社，1997），頁 225。

⁵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清末之譴責小說》，《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卷 9，頁 282。

二、釋名：烏托邦小說？小說的烏托邦？

關於本論文的命名問題牽涉到「晚清烏托邦小說」或是「晚清小說中的烏托邦視野」？前者涉及一個文類的概括，涉及某種時空下的美學、功能或形式規範，隨著時代演進而有消長。從社會學角度而言，「文類」反映觀念上的模範 (conceptual model)，在「小說」此一大文體種類之下，尚可依不同題材而分出諸多「次文類」(subgenre)，如言情小說、武俠小說、偵探小說、教育小說、科幻小說等。西方由於擁有長久的「烏托邦」書寫與評論，遂成「烏托邦文學」的次文類形式。⁶可是，對中國而言，由於書寫背景的不同，並無「烏托邦文學」的次文類觀念。因此，一旦使用「烏托邦小說」，可能一開始便會掉入無止盡的形名紛爭。本文暫且擱置次文類界分的爭論，而以更廣泛的「烏托邦視野」為指稱，可是此不意味著已解決「烏托邦」定義的問題，當中亦具主觀的判斷與取捨，如到底哪些作品可視為「烏托邦視野」呢？

在討論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前，實有必要先觀察「烏托邦」之義。「烏托邦」理論的界定充滿人為性，不同的論述主體各有其著重點，目的論強調實現烏托邦演變時間的過程，價值論以價值高下的觀點描述最終完美之境的目標。⁷大體而言，「烏托邦」一詞創自摩爾 (Thomas More, 1478-1535) 於 1516 年發表的專書《烏托邦》(*Utopia*)，描繪廢除私有財產與實行平等制度的理想社會。此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透過Raphael Hythloday批判英國現狀，揭露歐洲社會貧富懸殊的狀況。第二部分則全面勾勒烏托邦的空間視野與具體內涵，如法律、工作、衣著、娛樂等，描繪廢除私有財產後的理想社會，實行平等的體制，人們共同享有社會財富。

從語源而言，Utopia此一詞彙從希臘字根的解釋有二：Ou-topos，ou是「無」的意思，「topos」則為場所，是世上所無的場所；Eu-thopia，eu是「美好」之意，

⁶ 關於西方烏托邦文學的評論可見喬·奧·賀茨勒著，張兆麟等譯，《烏托邦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London: Philip Allan, 1990)等著作。

⁷ Eric Voegelin, *Science, Politics, and Gnosticism* (Chicago: Gateway Edition, 1968), pp.88-89.

是美好的地方。前者著重於世上所無的地方，後者標舉美好之境。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便結合此二語源，做出綜合性的解釋：

utopia暗示著一個既美好又子虛烏有的地方。在希臘語中eu相當於good（好），ou相當於not（無），莫爾運用了這種雙關性，utopia既可以指eutopia，即一個美好的地方，也可以指outopia，即子虛烏有的地方，或者可以同時擁有這兩種含義。⁸

當然，以上只是從詞義的角度來解釋。較為複雜的是：到底怎樣的實踐才能歸入「烏托邦」行列呢？

《烏托邦思想史》（*The History of Utopian Thought*）之作者賀茨勒（Joyce Oramel Hertzler）在提及「烏托邦」著述不受注意時便涉及研究範疇的問題：「似乎從來沒有人嚴肅認真地看待這些烏托邦著述，就連學者對之也不甚重視。文學史將此視為怪誕作品或視之為屬於政治學或治國術之類的東西而不屑一顧。政治學則認為烏托邦過於虛幻，也不科學，因而不大予以注意。宗教和神學界對其中少數問題研討過，但烏托邦思想的大部分嚴格說來與宗教無關。」⁹作為文學史、政治學、宗教、神學界各有不同的「烏托邦」的論述對象、方法與角度。當然，賀茨勒此篇書出版於1923年，當時確實較少關於烏托邦的學術論著。不過，該書出版的前後期卻有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的《烏托邦的故事》（*The Story of Utopia*, 1922）、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意識型態與烏托邦》（*Ideologie und Utopie*, 1929）等著作。

賀茨勒《烏托邦思想史》從整個長遠的西方史立論，系統性回顧與介紹各個烏托邦。他認為這些「烏托邦」著作在大多數情況下對當時的社會狀況作了精闢的分析，對未來的美好社會投射出明晰而生動的預測，並指出促進社會進步的方法和原則。他先以「倫理—宗教性的烏托邦」概述烏托邦思想家的先驅、啓示錄、

⁸ Miller David,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p.533.

⁹ 喬·奧·賀茨勒著，張兆麟等譯，《烏托邦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頁3-4。

上帝城等，接著論析柏拉圖「理想國」等，然後以「早期現代烏托邦」介紹烏托邦、新大西島、太陽城、大洋國等，再以「空想社會主義者」呈現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等人之理想，接著以「現代社會的理想—擬烏托邦」分析貝拉米《回顧》、赫茨卡《自由之鄉》、威爾斯《現代烏托邦》等具體的烏托邦內涵。現代烏托邦與之前的烏托邦具有一大差別，「差別在於前者能給予人以即將取得成功的感覺。他們實事求是地對待人們，並採用人們所熟悉的方法。完滿地實現他們的理想似乎指日可待……人們在這些烏托邦中看不到任何可以認為是不著邊際的東西、異想天開的東西。他們實際上乃是擬烏托邦。」¹⁰總之，他對於這些思想進行分析，考察其社會背景，概述其獨有特點，「烏托邦的基礎是烏托邦主義精神，既認為社會是可以改進的，而且是可以改造過來以實現一種合理的理想的。」¹¹

若從時空角度切入，我們可看到不同論者對「烏托邦」投射出不同的想像。在考夫曼（Moritz Kaufman, 1839-1920）的「烏托邦天性」裡，它是一個「烏有之地」，屬於某個遙遠的幸福之島，那裡具備完美的社會關係，純正優良的憲法以及永不過失的政府。人們過著單純而幸福的生活，遠離現實生活中的一切混亂、煩擾和無窮無盡的憂愁。¹²摩爾的《烏托邦》、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的《太陽城》（*La città del Sole*, 1602）都從空間意義擬想理想國的形態。可是，論者亦指稱此一遙遠的幸福之島實出自於人們天生的美好世界的傾向，因此烏托邦觀念是人類本性的產物，「各種各樣的社會理想，存在於人類心靈的身處……在不同情景中的形形色色的烏托邦模式，清楚地反映了潛藏於一切人心中同樣的理想主義傾向。」¹³

此一空間概念卻又有時間轉向，美國神學家保羅·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曾把「烏托邦」區分為「向前（未來）看的」和「向後（過去）看的」兩種，「每一種烏托邦都在過去之中為自己創造了一個基礎——既有向前看的烏托邦，同樣也有向後看的烏托邦。換言之，被想像為未來理想的事物同時也被投

¹⁰ 同前註，頁 221。

¹¹ 同前註，頁 4。

¹² Moritz Kaufmann, *Utopias* (London: Kegan Paul, 1879), p. 1. 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London: Philip Allan, 1990), p.12.

¹³ *ibid.*, p.13.

射為過去的『往昔時光』——或者被當成人們從中而來並企圖復歸到其中去的事物。」¹⁴就近代史而言，論者重視「未來」面向，跟進化論有關，如卡利內斯庫（Matei Calinescu）所說：「自十八世紀以來，烏托邦想像力的又一明證是現代對過去的貶低和未來的日增的重要性。然而，如果離開西方的特定的時間意識，烏托邦主義簡直就無法想像，因為它是由基督教和後來被理性所佔有的不可逆轉的時間概念所塑造。」¹⁵在時間的概念上，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提出「尙未」（not-yet）理論，是一種想像性、象徵性或者虛擬性的解決。它以對「現存」、「既定」的否定、排斥來肯定「將在」、「未來」，體現了否定與肯定的辯證法，在否定之中包含對肯定的期待，新的肯定的實現又內蘊新的否定。

關於理論的介紹，在台灣學界，由於張惠娟的引鑒，芒福德理論似乎成為烏托邦的衡量標準。芒福德在《烏托邦的故事》區分兩種烏托邦：「逃避烏托邦」（utopia of escape）與「重建烏托邦」（utopia of reconstruction）。「逃避烏托邦」指向「由著性子來的烏托邦」，「不受任何限制的慾望的無節制的氾濫」，¹⁶是一種危險的烏托邦形式，純粹屬於白日夢。人如果在夢中沈迷過久，就會軟弱無力，連日常生活中最簡單之事也應付不來，而患有精神妄想的烏托邦形式甚至具侵犯傾向；「重建烏托邦」則是指那種「重建人類生活環境的想像，使它更符合人存在的目的，更有利於人的可能性的充分發展」。¹⁷這種重建烏托邦的烏托邦會使人聯繫起馬克思關於「未來的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的論述，是一個完美的社會的構想，「無缺陷的制度、融洽的社會關係、全新的價值體系、宜人的風俗……甚至包括通過教育和生物進化而實現的完美的頭腦與肉體。」¹⁸

「烏托邦」脫離不了歷史脈絡，反映社會面臨的危機。若從西方的烏托邦發展歷程來看，十六、七世紀的烏托邦世界面臨工業化引發的貧富不均與不平等，

¹⁴ 保羅·蒂利希（Paul Tillich）著，徐鈞堯譯，《政治期望》（*Political Expectation*）（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頁 171-172。

¹⁵ 引自汪暉，〈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收入王曉明主編《批評空間的開創》，（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頁 12。

¹⁶ Lewis Mumford, *The Story of Utopia: Ideal Commonwealths and Social Myths* (London: Harrap, 1923), p. 108. 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p15.

¹⁷ 同前註，p.16.

¹⁸ 同前註。

於是將烏托邦世界和現實對立，推到現實世界外的島嶼，必須靠航海才能抵達，如同摩爾的烏托邦、太陽城等，透過海外島嶼構築理想世界，反過來批判現實中不自由、不平等的剝削性世界；十八世紀後半葉工業革命後，資產階級漸掌握政治主導權，市場經濟自立化，科技一日千里，對自然施以暴力，人亦脫離大地，成為不相統屬的個人與被宰制的對象，失去自由。因此，十九世紀初葉烏托邦主義者關心的是這些個人如何重新組合為沒有被剝削關係的生活共同體？聖西門（Saint Simon, 1760-1825）的「合作社」（cooperative association）把君王稱為「第一位工業者」，意圖以國王為中心，建立全國一體的工業共同體，以一千六百二十人為主，認為模範的結社一旦成立，世人就會模仿，進而加以採納。這是不假借由上而下的國家權力，而是由下而上建設自己生產與消費的共同體，並將社會視為這種共同體的聯合體。¹⁹發展至後工業時代的馬爾庫塞（Hebert Marcuse, 1898-1979），更是基於現代社會生產過程對人的「心理」和「本能」結構所造成的影響，如接受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的「異化」（alienation）概念，認為資本主義使人的本質的喪失到了極端，出現異化、操縱和壓抑、攻擊性等，「在這個世界裡，人類生存不過是一種材料，物品和原則而已，全然沒有其自身的運動原則。」²⁰他主張全面的解放策略，透過「大拒絕」的策略，即與現存制度採取不合作的態度，游離於現存社會和文化之外，同現存的一切完全徹底地決裂形成一種與現存社會完全不同的，更適合人類生存的本能結構和人類存在必不可少的需要。

當「烏托邦」的論述行之有年，產生了一批對於此理論反思的論述，針對烏托邦潛藏的諸多「反烏托邦」（dystopia）性做出深入的揭露與批判。卡爾·巴柏（Karl Popper, 1902-1994）在其經典的專書《開放的社會以及它的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描述最危險的「烏托邦工程」（utopian engineering）：看似賞心悅目的（烏托邦）思想進路卻內含極權主義性，蓋因在朝著烏托邦前進時，任何對此目標之可欲性的懷疑，都將使整個烏托邦工程岌岌可危。因此，所有個

¹⁹ 李永熾，〈近現代的烏托邦世界〉，《當代》第61期（1991.5），頁22-34。

²⁰ 馬庫塞（Hebert Marcuse）著，羅麗英譯，《愛欲與文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頁73。

體的選擇都必須加以約束，如建立一套「極權主義」的制度。²¹烏托邦作家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曾如此批評烏托邦的架構：「在關於烏托邦的思考中，總是有著僵固和薄弱的結果。其共同的缺點是空洞。生活中的血性、溫暖與事實，大部分都是缺乏的；在這種思考中，沒有有個性的個人，而只有一般化了的人民。」²²喬治·凱特布（George Kateb）針對烏托邦的秩序而言：「烏托邦思想受著一種『秩序王』所控制。烏托邦的強烈動因之一，是要使世界盡可能免於混亂，免於失去秩序。烏托邦就是一種對於秩序、安靜與平和的夢想。」²³對於秩序的追求，卻窄化了多元的選擇，使得更大的強權、專制出現。顧昕〈烏托邦與極權主義〉反思烏托邦，認為烏托邦會產生變化，秩序變成組織，滿足變成條件的反射，選擇的自由變成犧牲的自由，正好符合烏托邦的「異化」理論。

24

從上可見，「烏托邦」定義難以放四海皆準，而是有其語境的形塑與制約，如庫瑪（Krishan Kumar）指出：「烏托邦理想產生於對社會的回應。從古到今，社會都不是一個永恆不變的實體。因此，任何忽視歷史過程中社會變化的烏托邦研究都不可能避免地犯下了嚴重的錯誤。」²⁵不同的歷史情境與危機塑造出烏托邦的特殊面，反之，烏托邦的面貌又反映了特定的歷史情境。大體而言，無論就各家的說法，可歸納出其批判現實的功能，烏托邦「大抵代表一種難以實現的願望，卻對現實具有濃厚的批判性，同時也含有意欲建立完全自由而平等的生活共同體之意志。」²⁶在形式上，這些書寫經常是透過對比的方式，最常見的乃是透過空間與時間的方式懸隔理想之境，如摩爾《烏托邦》於海外塑造的完美烏托邦對應貴族對農民的侵略，《回頭看》則是以未來時間的塑造對應資本主義造成的貧富不均。如此的虛實對應，形成世外／世內的書寫。在內容上，這些小說都因各自的危機而有不同的因應之道，如《回頭看》採取社會主義克服貧富不均的社

²¹ 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1.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2), pp. 74-105.

²² H.G. Wells, *A Modern Utopi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67), p. 9.

²³ George Kateb導論，孟祥森譯，《現代人論烏托邦》（台北：聯經，1980），頁 14。

²⁴ 顧昕，〈烏托邦與極權主義〉，《當代》第 61 期（1991.5），頁 62。

²⁵ Krishan Kumar,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Basil: Blackwell Press, 1987), p. 2.

²⁶ 李永熾，〈近現代的烏托邦世界〉，《當代》第 61 期（1991.5），頁 23。

會。

擺放於晚清中國的脈絡，上述各種烏托邦論述雖無法直接比附或轉移，卻有助於比較而釐清。由於每一座烏托邦的發生奠基於屬於該時代的災難或危機，如《理想國》產生於希臘城邦的沒落，《烏托邦》產生於羊吃人的現實，²⁷曼努爾夫妻（Frank E. Manuel & Fritzie P. Manel）便指出，「基督的千禧之時，往往是無以復加的災難的出現。」²⁸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不同於摩爾筆下的「羊吃人」的社會，也不同於後工業時代的「異化」社會。就歷史進程而言，自近現代以降，中國面臨一波又一波的危機，主權慘遭侵奪、土地受到割裂，引發一連串具顛覆性的反思與批判，成為「天翻地覆」的時代。如此的災難與危機，恰好替晚清新小說建構出獨特的「烏托邦」框架，形塑出屬於晚清的「烏托邦視野」。

不同於中國傳統的理想書寫，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有其獨特面。無論是仙鄉、桃源等文學傳統，大多強調靜態簡樸、完美自樂的生活形態，不過，晚清新小說因處於中西交會，顯然吸取西方新知，「烏托邦」此一詞彙的翻譯便衝擊到中國固有的理想書寫的傳統，本文第二章將有詳細討論。就其內容而言，由於對應滅亡危機，晚清新小說展現的「烏托邦」視野有很強的政治感，「拯救中國」成為最大焦點。對於近現代的書寫而言，「拯救」有極端的書寫策略，一是作者透過批判引起療救的注意，一是直接列出各種拯救方案與提前想像中國的樂觀遠景。前者造就了譴責、諷刺小說，而後者則形成本文欲論述的「烏托邦」視野。在拯救中國的基調上，小說敘事一再逆轉現實，透由一連串方案，如〈情天債〉與《女媧石》強調女性的力量、《月球殖民地小說》與《冰山雪海》強調海外殖民、《新紀元》與《電世界》強調科學的力量、《新石頭記》與《黃繡球》對於傳統與現代文明兼取，思考中國的出路。從政治、性別、科技、文化到教育等，手段迥異，使得此類小說可被晚清作者或編者群列為理想小說、社會小說、科學小

²⁷ 摩爾在《烏托邦》裡批判貴族侵佔農民的土地，無家可歸的農民被迫流入城市，成為賣力為生的無產者，承受過長的工時、過大的勞動、疾病死亡，摩爾深刻地批判：「你們的羊一向是那麽馴服，那麽容易餵飽，據說現在變得很貪婪、很凶蠻，以致吃人，並把你們的田地，家園和城市蹂躪成廢墟。」莫爾著，戴錫齡譯，《烏托邦》（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 21。

²⁸ Frank E. Manuel & Fritzie P. Manel, *Utopia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46.

說、冒險小說、殖民小說等，恰好凸顯其駁雜的內容。不過，看似琳瑯滿目，卻是殊途同歸，其魂牽夢縈的乃是屬於政治面的「新中國未來記」，各篇小說替中國預約樂觀的遠景，反映烏托邦的理論：現實的匱缺投射到烏托邦。這批小說介入國家進程，逆轉現實的頹勢，以「國富民強」為追求目標，替天翻地覆的中國重構世界中心的位置。

在形式上，這些書寫有著對照的框架：現實與理想。各篇小說固然犀利地批判黑暗舊中國，可是卻也投射出一個光輝燦爛的新中國，形成世內／世外的對照組合。作者群經常使用他方、未來與夢境作為一道躍過現實而進入理想的方式，「未來」乃是對照「當下」，「他方」乃是對照「此方」，「夢境」乃是對照「現實」，以此產生一道隔離卻又相連的效果。更新人耳目的是這些小說吸取西方的科技新知，大量在未來、他方與夢境中塑造出「世界外之世界」的想像，人物透過先進的交通工具「上下而求索」，遊覽各大星球與海底，替中國「別尋世界」，使得人間、島嶼、月球、海底都可成為「烏托邦」的載體，構築出晚清小說史的「遍地烏托邦」的視野。

如上所言，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一方面如同各烏托邦所具的批判、反思、拯救現實的功能，一方面卻又投射出其獨特的面貌，回應晚清中國受到列強侵略的危機，一再發出「拯救中國」的呼聲。在形式上，這些小說塑造出世內／世外的對比框架，且融入各種科技新知，使得中國的理想書寫產生變調。

三、研究方法：從概念考掘到敘事分析

如果說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長期未獲相對應的重視，那麼我們要如何重新挖掘材料，替此方案建構出深沈的評論視野呢？由於「烏托邦」是自西方傳入中國的概念，一旦作為研究，必定牽涉到「烏托邦」詞彙的翻譯與概念變調、小說敘事對此概念的挪用、小說的刊登與分類等問題。為涵蓋這些問題，本文採取以下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概念考掘

本文探討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首先必得觸及「烏托邦」詞彙的翻譯。此一詞彙由西方傳入中國，可是卻因其概念的普遍性而遮蓋了文化翻譯的問題。許多論者論述「烏托邦」時太輕易將它普遍化或置於（西方）烏托邦理論的脈絡。事實上，「烏托邦」於晚清並非懸空的概念，早在 18 世紀 70 年代流傳於晚清的華英詞典出現「烏托邦」的詞條、1894 年嚴復譯《天演論》時亦提到烏托邦。從小說創作而言，蕭然郁生已將他的小說命名為《烏托邦遊記》，書中主人翁偶聞英國有烏托邦小說，非常嚮往，夢中得高人指點，於是到「何有鄉」搭船往遊烏托邦。無論是華英詞典、思想論述、文藝批評、小說實踐都可見到「烏托邦」的身影，由此可證此一詞彙與概念已普遍進入晚清時人的視野。在此前提下，本論文追溯「烏托邦」此一詞彙如何進入晚清視野的途徑？Thomas More 及其著作又如何流入？此一詞彙所轉換的概念如何被錯置於晚清脈絡？換言之，晚清人士如何挪用「烏托邦」的概念？如此的概念又如何跟中國本身的理想概念融合呢？

（二）編譯系統

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牽涉到中西方的文學傳統與資源，反映出中西之交會。不過，作者群編譯大同、仙鄉、桃源、烏托邦、未來等中西資源時，並非亦步亦趨，而是選擇性轉化，經由「誤讀」機制的介入，涉及召喚、選擇、鬥爭、改寫等歷程，進而確立屬於晚清的「烏托邦」視野。當然，作者群對於各種資源的編譯，必然使得文學圖像產生「變異」，本文便以尤能顯現中西痕跡的新編、譯編與轉編等晚清書寫現象，探討作者群如何編譯中西資源？文學圖像如何變異？「新編」乃是作者透過中國傳統的故事或經典，重新注入新的意涵、價值、想像或敘事；「譯編」則是對於域外小說的翻譯，注入了譯者本身的理念、信仰或目的；「轉編」涉及範疇的轉變，由思想界轉入文學界。我欲追蹤的是：晚清

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如何在續編／譯編／轉編的過程中確立？此具體圍繞於晚清語境的「烏托邦」概念及起源問題是目前近現代研究界最缺乏、亦是最值得進行的追溯與重構工作。本文掌控多種資料，透過晚清報章、期刊、出版書目等，盡量蒐集具有烏托邦視野的作品，²⁹並且尋找各小說對於「烏托邦」、「大同世界」、「黃金世界」、「桃花源」、「極樂世界」等概念的挪用，一一擷取，進而比較、分析及探討。

（三）小說分析

本文處理晚清新小說經由「編譯」而「變異」的「烏托邦」視野，當然，有一重要的討論：這些烏托邦視野產生怎樣的變異？為探討這些變異，必得從小說敘事介入。小說敘事透過人物、事件、情節等傳達特定的訊息，就這些烏托邦視野而言，傳達著一些共同點，如救國欲望、前瞻性時間、批判性視野、現代性價值（如科學與民主）。本文透過文本細讀，分析小說內的人物與敘事，進而突顯出其在中國文學傳統中的變異。當然，每座「烏托邦」都是對比架構下的產物，諸如黑暗與光明、美好與醜惡、圓滿與殘缺等對照。不過，如此說法尚嫌籠統，較難凸顯其獨特性。本論文試圖透過小說敘事的分析，為這些晚清的烏托邦視野尋找出更細緻的論點；另外，本文考量到承載此類小說的形式問題，雖然晚清文化界未將「烏托邦」列為小說類別，不過，本文卻追蹤到底這些具「烏托邦」視野的作品最常被劃入哪些類別呢（如理想小說、哲理小說、科學小說、國民小說等）？最常出現於哪一種報刊（如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等）？小說內最

²⁹ 這些作品或刊登於報刊或由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刊登於報刊如：《萬國公報》的《回頭看記略》，《新小說》的《新中國未來記》、《黃繡球》，《繡像小說》的《小仙源》、《維新夢傳奇》、《回頭看》、《癡人說夢記》、《月球殖民地小說》，《女子世界》的《情天債》，《俄事警聞》的《新年夢》，《小說時報》的《未來世界》，《科學世界》的《蝴蝶書生漫遊記》，《民報》的《獅子吼》，《月月小說》的《烏托邦遊記》、《未來世界》、《光緒萬年》等；由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如：群學社出版的《千年後之世界》，東亞編輯局出版的《女媧石》，上海啓文社出版的《鄒談一噓》，新世界小說社的《憲之魂》、《新水滸》，上海集成圖書公司的《中國新女豪》，作新社刊本的《女子權》、小說林社的《黃金世界》、《新紀元》，小說進步社的《新三國志》，改良小說社的《新野叟曝言》、《新中國》等。

常出現什麼元素（如科學、政治、社會改革）？唯有透過更廣闊的文化視野——文學類型、報刊出版、文人作者等層面的介入，才能夠具體建構出晚清語境的「烏托邦」視野。

（四）思潮援引

本文主要論證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對象是小說文本，但是，卻未必侷限於小說內部。我試圖將此烏托邦視野置入晚清語境評估，勾勒出各種可能相關的思潮。晚清小說的「烏托邦」視野是迷人的空間狂想史，承載了一個時代的有關世界、科學、哲學、文學等有機知識的綜合價值。因此，在論證小說時，本文援引各大小議題或思潮。當然，本文並非欲從「史學」角度考察小說中的思潮，而是從「小說」角度出發，思考作者群如何透過小說書寫捲入或參與各種思潮？因此，小說不只是一個被動的客體而已，而是捲入了整個思潮的建構。在此研究視角下，本文便將論述置入晚清建構「希望」論述的場域，從傳教士、中國知識分子、刊物、文體、領域等角度分析不同的「論述位置」如何在晚清此一「天崩地裂」的年代呼喚出「希望」之聲。同時，本文又考量到類似西方科技、政治體制、新國民等思潮如何支撐起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

四、研究範疇：以「新小說」為中心

本論文主要論述的對象是小說文本，著重於具有「烏托邦」視野的小說。從小說文體來看，晚清「小說」的觀念仍在建構中，敘事文學包含古典故事、長篇小說、彈詞、戲劇等。我欲研究的小說主要集中於「新小說」，也是梁啟超等人抬高地位、注入新思想的小說。

本論文的研究材料大多為 1902 年後的小說，不過卻有一篇翻譯於 1891 年、刊登於《萬國公報》的小說《回頭看記略》（1894 年，此小說翻譯改名為《百年

一覺》，由廣學會出版）納入研究範疇。此小說講述百年後醒來的美國主人翁看到過去貧富不均衍生的諸多亂象轉變成完美的社會圖景，無疑提供晚清知識分子關於「烏托邦」書寫的形式與內涵。基本上，1902年是梁啟超發起「小說界革命」的時間點，對於小說技術、內涵產生革命性的影響。陳平原便曾指出：自1902年梁啟超於日本橫濱創辦《新小說》雜誌開始，「新小說」成為概括在小說界革命中產生的一批小說作品的專有名詞。此一取名實借用日本1889與1896年兩次創辦的同名雜誌。就晚清的「新小說」而言，基本上相對於「舊小說」，時人自覺地把作為小說界革命產物的新小說和在此之前存在的中國傳統小說（舊小說）區別開來。³⁰此一新小說與舊小說的區分，不只是文學本身的改革，更牽涉到社會政治的改革，如黃錦珠指出晚清的小說改革與政治、社會改革相互含攝，形成「小說界革命」理念的脈絡：

若欲細繹其條理，可以從兩大範疇分別考察：一是「小說界革命」如何達成政治、社會改革之時代使命；二是「小說界革命」如何完成小說自身之改革。也可以說「小說界革命」有兩大指標，一是政治、社會方面的目的；一是文學方面的目的。實際上兩者必須同時達成，才能支持其中任一者順利達成。假如政治、社會的改革停下來，小說失去新思想內容的泉源，其自身的改革也等於中止；解如小說的改革停頓，理論上雖可以有其他社會改革途徑，但如前文所述，事實上梁氏的維新事業便失去一個重要管道，特別是以廣大民眾為對象的這一管道。³¹

確實，「新小說」承載著相輔相成的文學自身與社會政治的改革，使得其「功能性」大增。陳俊啓則是深入透過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提出的小說四種基本的感化力量：「熏、浸、刺、提」的作用，勾勒出新小說的高度使命感與任務

³⁰ 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8-9。

³¹ 黃錦珠，〈「小說界革命」與小說觀念之轉變〉，《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臺北：文史哲，1995），頁91-92。

性，強調新內容和新思想，小說的內容應是有關社會、政治改革的思想。³²由上各學者的論文已為我們指出「新小說」此一新興形式被置於政治框架，成為文人志士抒發抱負、維新救國的工具。

就「新小說」的各種高度的改革功能而言，陳建華更是指出其「含有濃厚的烏托邦性質。既擔負起啓蒙『新民』的思想功能，小說就已經成為『群治』的政治機制的一部分，而這『群治』或『新民』都僅僅存在於梁氏的以西方某種『公民社會』為藍圖的政治設計中。然而在形式上小說卻成為『現代性』的一種比喻，真正顯示了『小說界革命』的內蘊，並為後來的中國革命與小說實踐所證實：小說的形式猶如社會運動，永遠是開放的、實驗的。」³³所謂「小說界革命」便是將「小說」變為「大說」：小說應當成為民族的文學，描寫民族生活、民族精神。陳建華將晚清的小說與民族主義同時凸顯於社會思想的前台，「正與安德森所謂現代小說、報紙催生民族主義『想像社群』的說法不謀而合」，因為小說分享了「小說界革命」所召喚的「民族國家」的前景，也受賜於現代印刷技術與報刊雜誌的發行系統，包括電訊郵航等。³⁴

除「新小說」為研究的材料，本文亦顧及與新小說有密切關係的翻譯小說。翻譯小說對晚清新小說的影響已是公論，在「烏托邦」的書寫線索上，《回頭看記畧》或《百年一覺》等小說更提供了書寫的借鑑。在「烏托邦視野」的軸線上，本文盡可能收集完整材料，一一挖掘諸多被淹沒或忽略的材料。這些材料散落於各地圖書館，從台灣圖書館（中研院近史所、文哲所與傅斯年圖書館）、大陸圖書館（如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蘇州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到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與資料庫等。

由於材料龐大，因此必得交錯使用各種挖掘材料的方式。首先，在各圖書館大量閱讀晚清報刊，諸如《新小說》、《新新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繡像小說》、《小說時報》、《新民叢報》、《清議報》、《俄事警聞》、《東方雜誌》、《申

³² 陳俊啓，〈重估梁啓超小說觀及其在小說史上的意義〉，《漢學研究》第20卷第1期（2002.6），頁309-338。

³³ 陳建華，〈新小說與想像社群〉，《讀書》2000年第1期，頁22。

³⁴ 同前註，頁23。

報》、《萬國公報》、《遊學譯編》、《新世界小說社報》、《新世界》、《小說新報》、《朔望報》、《時報》、《女子世界》、《砭群叢報》、《小說月報》等，觀察刊登於這些刊物的作品，找出具有「烏托邦」視野的小說。此外，透由兩岸出版各類近現代小說集與晚清小說集等套書尋找線索，如上海書店的《中國近代文學大系》、江西人民出版社《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廣雅出版社的《晚清小說大系》等皆是資料來源之一。除大量閱讀外，本論文亦透過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張兵編《五百種明清小說博覽》、樽本照雄編《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等工具書及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香港中文大學劉青峰與金觀濤教授主持「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數據庫」等資料庫，更完整蒐集相關材料。

年份	類型	篇名、作者、出處
1891	翻譯	1、《回頭看記略》，二十八章，(美)畢拉忒(Edward Bellamy)，析津(李提摩太)譯，《萬國公報》35-39(1891.12-1892.4)
1894	翻譯	1、《百年一覺》，(英)李提摩太節譯，上海廣學會
1902	小說	1、〈新中國未來記〉五回，梁啟超著，《新小說》1、2、3、7號
1903	翻譯	1、《夢遊二十一世紀》，(荷)達愛斯克洛提斯著，Dr.Alexx.V.W.Bikkers 英譯，楊德森漢譯，《繡像小說》1-4期(1903.5-1903.7) 2、《小仙源》，戈特爾芬美蘭女史著，《繡像小說》3-14期
	小說	1、《情天債》四回，東海覺我(徐念慈)著，《女子世界》1-4期 2、《瓜分慘禍預言記》十回，題「日本女士中江篤濟藏本，中國男兒軒轅正裔譯述」(實為鄭權託名「軒轅正裔」的創作)，上海獨社鉛印本 3、《黃人世界》八回，不題撰人，《遊學譯編》11、12期。
1904	翻譯	1、《回頭看》，十四回，(美)威士著，《繡像小說》25-36期 2、《千年後之世界》，(日)押川春浪著，天笑(包天笑)譯，群學社 3、《蝴蝶書生漫遊記》，(日)木村小舟著，茂原築江譯意，蛟川王本祥潤文，《科學世界》10期

	小說	<p>1、《新年夢》，蔡元培著，《俄事警聞》（1904年2月17-20日，24-25日）</p> <p>2、《女媧石》，海天獨嘯子著，臥虎浪士批，東亞編輯局鉛印本，甲卷1904，乙卷1905</p> <p>3、《癡人說夢記》三十回，旅生著，《繡像小說》19-54期</p> <p>4、《月球殖民地小說》三十五回，荒江釣叟，《繡像小說》第21-62號</p>
1905	小說	<p>1、《獅子吼》八回，陳天華著，《民報》2-9期</p> <p>2、《黃繡球》二十六回，頤瑣著，《新小說》11-24號（1907年出單行本，三十回）</p> <p>3、《新石頭記》四十回，老少年（吳趼人）著，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南方報》載，十三回。1908年10月上海改良小說社出單行本，四十回</p> <p>4、《獅子血》十回，何迴著，雅大書社鉛印本</p> <p>5、《女子世界》，志群著，《女子世界》14期</p> <p>6、《盧梭魂》，懷仁編述，光緒刊鉛印本</p> <p>7、〈苦學生〉，不題作者，《繡像小說》63-67期</p>
1906	小說	<p>1、《鄒談一嘯》二十四回，烏程蟄園氏著，1906年上海啓文社刊本</p> <p>2、〈烏托邦遊記〉四回，蕭然郁生著，光緒三十二年九月《月月小說》1-2號</p> <p>3、《夢想世界》，笑（包天笑）著，《時報》1906年9月2日-10月14日</p> <p>4、《冰山雪海》十二回，作者存疑，科學會社刊本³⁵</p> <p>5、〈中國興亡夢〉，冷血著，《新新小說》1、2、5期</p>

³⁵ 根據魏紹昌考證此小說版權頁雖署李伯元，卻非李伯元作品。見魏紹昌，〈《冰山雪海》是冒名李伯元翻譯的一本假貨〉，《清末小說》第三期（1979.12）。

1907	小說	<p>1、《未來世界》二十六回，春帆（張春帆）著，《月月小說》10-20、22-24 號</p> <p>2、《憲之魂》十八回，不題撰人，新世界小說社刊本</p> <p>3、《中國新女豪》十六回，思綺齋藕隱著，上海集成圖書公司刊本</p> <p>4、《女子權》十二回，思綺齋著，作新社刊本</p> <p>5、《黃金世界》二十回，碧荷館主人，小說林社</p> <p>6、《新水滸》二十八回，西冷冬青，新世界小說社</p>
1908	翻譯	<p>1、《新理想國》，署「譯東報」，《申報》（1908 年 3 月 11 日-3 月 31 日）</p>
	小說	<p>1、《新紀元》二十回，碧荷館主人編，上海小說林社刊本</p> <p>2、《光緒萬年》，吳趸人著，《月月小說》13 號</p> <p>3、《笏山記》，東莞冷道人守白氏（蔡召華）著，上海廣智書局刊本</p> <p>4、《新鼠史》，柚斧（李涵秋）著，《月月小說》22-24 號（2 年 10-12 期）</p> <p>5、〈新舞台鴻雪記〉二回，陶報癖，《月月小說》15 期</p>
1909	小說	<p>1、《新三國志》二十四回，珠溪漁隱著，上海小說進步社刊本</p> <p>2、《新三國》三十回，陸士諤著，改良小說社刊本</p> <p>3、《新野叟曝言》二十回，陸士諤著，上海改良小說社（另 1928 年上海亞華書局出版）</p> <p>4、《電世界》十六回，高陽氏不才子著，《小說時報》1 年 1 號</p> <p>5、〈烏托邦之豪傑〉，七章，悲盦著，《砭群叢報》1-7 期</p>
1910	小說	<p>1、《新中國》（一名《立憲四十年後之中國》）十二回，題「青浦陸士諤雲翔甫撰」，改良小說社刊本</p> <p>2、《新水滸》，陸士諤著，改良小說社刊本</p> <p>3、《新殖民地仲尼島》，海外野人著，《雲南》19-20 號</p>
1911	翻譯	<p>1、《未來世界》，心一譯，《小說時報》13 期（宣統三年八月望日，即 1911 年 10 月 6 日）</p>

本文雖以晚清「新小說」為主，可是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雜歌、傳奇、歌

謠等文體亦承載此類書寫。³⁶這些作品從「光明面」想像未來中國的可能性，對現代民主、國家形式、科幻想像給予熱忱關注，過去一直不受注意。如果說「烏托邦」是這個時代的「希望」之曲，那麼必不只侷限於新小說，而是透過各種文體反映，成爲集體的文化結構。因此，本文探討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時，將輔以雜歌、傳奇、歌謠等材料。

五、文獻回顧：誰的烏托邦？

就晚清小說評論而言，晚清至民國的評論不太重視具有烏托邦視野的小說。若是觀察此一時期的文學史便可發現此一趨勢。胡適（1891-1962）爲慶祝《申報》創刊五十周年、寫於 1922 年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追溯自《申報》出世、曾國藩（1811-1872）過世的 1872 年以降的文學流變，牽涉到桐城派的式微、古文學的變化、新文學的發展等，論述立場相當鮮明，以「死文學」（古文）與「活文學」（白話）爲區分。其中第九節〈活文學——白話小說〉把晚清小說按地域分爲北方的平話小說、南方的諷刺小說兩類評述，前者如《兒女英雄傳》、《七俠五義》是「平民的消閒文學」，後者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恨海》是「社會問題的小說」。³⁷如此的視野廣泛反映於民國的文學史書寫，如 1923 年，魯迅（周樹人，1881-1936）以三年時間編著而成的《中國小說史略》問世，被視爲「中國小說無史」的終結者。³⁸就其對晚清小說的分類，可見「狹邪小說」、「俠義小說及公案」、「譴責小說」三類，按類別追溯內容、藝術淵源，

³⁶ 這些作品如刊登於少年中國之少年〈愛國歌四章〉（《新小說》第 1 號）、嶺東故將軍〈出軍歌四章〉（《新小說》第 1 號）、《維新夢傳奇》（《繡像小說》1-6 期，署名「惜秋填詞」。第七齣「講武」（載第 9 期），署「鯽士倚聲」。第八齣「勸學」（載第 19 期）至結尾，署「旅生續」）、珠海夢餘生〈粵謳新解心四章〉（《新小說》第 10 號）、寄憤生《警黃鐘傳奇》（《新小說》第 9-17 號）、蛻秋倚聲〈時調唱歌·自強歌〉（《繡像小說》第 26 期）、曼殊室主人《班定遠平西域》（《新小說》第 19-21 期）、雙菫室主人〈環球攬勝圖〉（《小說林》第 9 期）等。

³⁷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收入申報館編，《最近之五十年》（臺北：文海出版社，2001），頁 15-18。

³⁸ 阿英評論此書時曾提及「中國的小說，是因他而才有完整的史書，中國小說研究者，也因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的產生才有所依據的減少許多困難，得著長足的發展。」見阿英，《小說四談·作爲小說學者的魯迅先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186。

揭示其產生的時代背景。³⁹此外，其可視為《中國小說史略》的通俗簡要版的《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在列出清小說的四派及其末流時（如諷刺派、人情派、俠義派等），亦未見烏托邦小說。

稍有觸及到這類小說的是周作人（1885-1967）著於 1927 年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把中國兩千年的中國文學史，看作是「言志」與「載道」兩派此消彼長的過程，追溯了明末至五四的文學變化。其中於近代文學部分提及發表於《新小說》的科學小說《海底旅行》、政治小說《新羅馬傳奇》、〈新中國未來記〉等時，卻出現轉折語氣：「不過，這些作品都不是正路的文學，而是來自偏路……他是想藉文學的感化力作手段，而達到其改革中國社會的目的。」⁴⁰由此可見，類似〈新中國未來記〉等作品被視為「偏路」，顯然不列入正統代表。

1928 年，陳子展（1898-1990）應田漢（1898-1968）之邀為南國藝術學院近代文藝講座，擬用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為講義，但又覺不足以反映近代文學的全貌，寫出《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正式使用「近代文學」的概念。他認為「近代」從戊戌變法開始，「從這時候起，古舊的中國總算有了一點近代的覺悟」。其中，〈小說界革命之前後〉一文列出了晚清小說界的系譜：其前乃是玉梨魂派、聊齋魂派，其後則是隨魯迅步伐，以南亭亭長（李伯元，1867-1906）與我佛山人（吳趸人，1866-1910）為代表，評論以諷世／譴責小說為主。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⁴¹《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⁴²皆論述了「譴責小說」的產生、時代背景，評論四大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卻不見關於「理想」的書寫。

阿英（錢德富，1900-1977）是較早且全面性梳理晚清小說的著者，自三十年代開始研究晚清文學，在資料整理方面，有《晚清小說史》、《晚清戲曲小說目》、

³⁹ 《中國小說史略》中的最後三章：〈清之狹邪小說〉、〈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清末之譴小說〉述及晚清小說的內容。書中把十九世紀中後葉印行的專寫妓家故事的《品花寶鑒》等數部長篇白話小說稱之為狹邪小說，把二十世紀初問世的《官場現形記》等數部小說稱之為譴責小說。分別見魯迅，《魯迅全集》，卷 9，頁 256、269、282。

⁴⁰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周作人自編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卷 9，頁 49-50。

⁴¹ 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上海：中華書局，1929）。

⁴² 陳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6）。

《晚清文藝報刊述略》、《中國近代反侵略文學集》、《晚清文學叢鈔》等。193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晚清小說史》是較早將晚清小說作為斷代小說史的研究著作，對晚清小說產生、發展、繁榮的原因，及晚清小說的思想內容、藝術結構的特徵等都有比較深入的論述。書中以作品的題材、內容將晚清小說分為十二類，當中提及不少涉及「烏托邦」視野的小說。⁴³

就整體的研究而言，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學界較少出現專門的「烏托邦」研究。論者主要從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把烏托邦侷限於空想社會主義，對其空想性進行批判，如吳易風的《空想社會主義》（1980），王蘭垣、余金成主編的《空想社會主義比較論》（1991）等。不過，90年代以後，烏托邦研究受到重視，如陸俊《理想的界限——現代烏托邦社會主義研究》（1998）、章國峰《關於一個公正世界的烏托邦構想》（2001），陳岸瑛《新烏托邦主義》（2001）、龔群《道德烏托邦的重構》（2003）等重新對「烏托邦」提出解讀、分析、評價，著作。當中，更有論著透過史學的方式回顧西方烏托邦，進行反思，如陳周旺《正義之善》（2003）從政治學的角度評論烏托邦，衣俊卿《歷史與烏托邦——歷史哲學：走出傳統設計之誤區》（1995）與賀來《現實生活世界：烏托邦精神的真實根基》（1998）則從哲學的角度評論烏托邦，都呈現了系統性的研究。

就史學界而言，此一、二十年內出現各單篇論文，關注到「烏托邦」與近現代的關係。張灝〈轉型時代中國烏托邦主義的興起〉指出烏托邦思想於近現代轉型時期（1895-1925）的重要性。其興起有兩個語境：（一）雙重的危機：傳統秩序解體的危機與文化基本取向脫序危機；（二）傳統思想的嬗變與西方文化流入的互動。文化失序使得人們對生命與宇宙的秩序與意義感到失落，傳統儒家的宇宙觀與價值觀把生命與宇宙視為整體，但當這些宇宙觀與價值觀發生動搖，中國知識分子感受到精神意義的失落以及隨之而來的焦慮與矛盾。「這不僅是政治秩

⁴³ 阿英，《晚清小說史》關注到「形形色色，充分的表現了一種過渡期的現象」的作品。在此一過渡期當中，包含了諸多具有烏托邦視野的作品，如第七章「立憲運動兩面觀」便評論〈新中國未來記〉、《未來世界》、《憲之魂》，第八章「種族革命運動」討論《獅子吼》、《盧梭魂》、《東歐女豪傑》，第九章「婦女解放運動」討論《黃繡球》，第十三章「晚清小說之末流」討論《新石頭記》等。

序的探求，也是對『世界觀與人生觀的象徵符號』的追尋。」⁴⁴烏托邦在這時期的發展可分為兩型：硬性與軟性。前者相信當下的現實社會可被徹底改變，並立即躍進為理想秩序，以康有為與胡適為代表；後者則不信人有徹底改造社會的能力，只寄望完美的未來能在歷史進程中緩慢實現，以譚嗣同、劉師培與李大釗為代表。作者針對這兩類型的代表人物，逐一展開分析，論述各人物對於烏托邦的締造內涵。

一般而言，學者習於將晚清的某思潮或社會狀態比附為「烏托邦」，進而研究其源起原因、狀態及內涵。金觀濤〈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精神〉便指出：「烏托邦主義的勃興，必須有兩個社會條件，一個是西方學者常說的現實社會的苦難，另一個是民族文化中原有的社會怎樣才算完美的價值。」⁴⁵他在另一篇論文〈中國革命烏托邦的起源：論道德理想主義演變的邏輯〉指出中國現代思想中的革命烏托邦並非一般意義上的不可實現之理念，其核心是新道德，其本質是一種只需在想像中存在並不具有可行性的新道德。這些新價值都主張沖決儒家綱常羅網和解除一切束縛。晚清勾勒出的大同思想與傳統《禮運》篇已不同：萬古不變的天理被進化論和沖決羅網的革命精神所擊碎，大同思想也被重新詮釋，「這時由於大同理想中的道德含義再也不是儒家倫常，而是沖決羅網的逆反價值，於是那些本由道家價值規定的內容如取消制度、差別等被注入現代和西方名詞變成容納逆反價值的框架。大同烏托邦被魔化了。」⁴⁶這是新時代的社會理想：自由平等之價值落實到政治上就是主張民主、民權、大眾參政。此外，他也稱無政府主義者一方面希望創立一個無差別的世界，一方面把暗殺、破壞、消滅當作一種全新的道德。與漸進改良的知識分子不同，他們大多主張用革命、暗殺、破壞等來加速舊秩序的滅亡，促使理想世界早日到來。

許紀霖〈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討論〉將自由主義與烏托邦掛勾，指出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討論，

⁴⁴ 張灝，〈轉型時代中國烏托邦主義的興起〉，《新史學》第14卷第2期（2003.6），頁4。

⁴⁵ 金觀濤，〈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精神〉，《二十一世紀》1990年第2期，頁18。

⁴⁶ 金觀濤，〈中國革命烏托邦的起源：論道德理想主義演變的邏輯〉，《亞洲研究》第30期（1999.4），頁65。

以蔡元培領銜的中國十六名自由知識分子聯名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此被視作中國「自由主義的觀點的第一次系統的概括」的宣言。此文實由胡適發起和起草，轟動全國輿論界，並引發一場「好政府主義」的討論。⁴⁷李赫亞〈兩種未來社會理論的誕生——傅立葉康有為社會烏托邦思想形成之比較〉從比較觀點出發，提出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與康有為（1858-1927）對於「未來社會」模式的同異之處，體現兩種社會烏托邦思想的基本特點：求異至衡與求一至同，這是因為兩種社會烏托邦思想形成於不同的社會背景、思想來源和哲學基礎。⁴⁸

我欲集中焦點的是晚清小說的烏托邦研究。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中，最能系統性研究的是學位論文。目前學界有兩本關於「烏托邦」的學位論文，一是北京大學中文系郭夔完成於1997年的碩士論文，其後亦刊登於日本《清末小說》的〈論晚清政治烏托邦小說〉，初步列出二十三部政治烏托邦小說，結合史料對政治烏托邦小說興起於晚清的歷史文化背景進行了分析，認為這一現象是晚清歷史條件下，西方政治哲學思想、政治小說與中國原有的烏托邦傳統融匯的結果。在詳細介紹這些小說中烏托邦社會的具體設計之後，郭夔概括了晚清政治烏托邦小說在思想內涵上的現代性及其藝術特色和不足之處。⁴⁹其後，清大研究生李廣益的碩士論文《大同新夢——清末民初文學烏托邦研究》亦在此基礎上增列論文（其中，部分篇目由我提供）。該論文指出寫烏托邦文本的作者既有梁啟超、蔡元培、陳天華等思想鬥士，又有吳趸人、包天笑、陸士諤等文壇名家；作品有《新中國未來記》、《新石頭記》、《新三國》、《電世界》等在思想和藝術上都卓然成家的傑作；又有《新小說》、《月月小說》、《繡像小說》等重要雜誌與小說林社、小說進步社、改良小說社等重要書局，「所以，回首清末民初文壇，文學烏托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存在。」⁵⁰基本上這兩本碩士學位論文在文獻整理上都有拋磚引玉之作

⁴⁷ 許紀霖，〈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討論〉，《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頁115-133。

⁴⁸ 李赫亞，〈兩種未來社會理論的誕生——傅立葉康有為社會烏托邦思想形成之比較〉，《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6卷第4期（2003.7），頁105-108。

⁴⁹ 郭夔，〈論晚清政治烏托邦小說〉，《清末小說》第22號（1999.12），頁53-86。

⁵⁰ 李廣益，《大同新夢——清末民初文學烏托邦研究》（北京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07），頁29。

用，完成階段性任務。

對於「烏托邦」的定義而言，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以「樂園」與「烏托邦」的區分來界定中國文學：「樂園」是屬於靜態的，嚮往簡樸的生活，是一個「架構的自足（self-sufficient）而封閉的體系」。反之，烏托邦則是動態，是一個理想與現實交織，美好與醜惡交融的所構造的一個活潑的園地。她認為晚清小說首開烏托邦精神，相對於陶淵明式的隱退、超越以及閉關自守的靜態樂園，晚清小說則是一幅根植於現世、充滿各種可能變數的動態畫面，小說中「理想中的小世界（microcosm）乃中國此一大世界（macrocosm）的可能縮影；英雄之進駐此小世界，非為獨善其身，而為獲得其兼善天下之根據地。晚清小說中之『桃花源』，因之絕非超然入聖。其基本特質，是向外膨脹、向外探求、汲汲於達成現世樂園的理想；其前瞻心態，自也不同于一意緬懷過往的傳統桃花源。」⁵¹張惠娟的區分引起諸多迴響，似乎已成臺灣中文學界的標竿。

就烏托邦書寫的特質而言，「未來」是論者關注的主要點。張全之〈文學中的「未來」：論晚清小說中的烏托邦敘事〉區分晚清烏托邦與傳統的理想空間。不同於傳統的「文武周公」的德治（儒家），或在「小國寡民」（道家）式的無為而治，晚清維新派與革命派對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改變了傳統烏托邦的想像，預示著中國走向現代，加入世界發展潮流成為可能。他亦從「對立」與「因果」關係比較中西烏托邦，西方烏托邦多處於「理想」與「黑暗」的對立，如摩爾《烏托邦》、康帕內拉《太陽城》。梁啟超的「烏托邦」與現實卻是從對立走向因果，建立邏輯上的虛擬關係：以前的「因」結成「今日」繁榮之「果」，因此理想不再是海市蜃樓，而是一座近在咫尺的海島。⁵²王德威的〈混亂的視野——科幻奇譚〉對於「未來」的書寫亦有深刻反思，以《新中國未來記》為例，通過「未來完成式」的倒敘，未來的中國預先來到，隨之而來的是如何填補「現在」與「未來」之間的歷史空檔，也正是小說未完成的部份。王德威認為此書要處理的並非未來數十年間可能會（may）發生的情況，而是已經要（will have）發生

⁵¹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中外文學》第15卷第3期（1986.8），頁89。

⁵² 張全之，〈文學中的「未來」：論晚清小說中的烏托邦敘事〉，《東岳論叢》第26卷第1期（2005.1），頁126-130。

的情況。由此，梁啟超的「未來完成式」隱藏著三種不同的時間表：一、未來像是在歷史另一端的神奇時刻，是歷史前進動力的極端，是一種超越時間的神話性一刻。二、想像中的未來新中國，其實只是歐洲列強模式的翻版，1962年的新中國可能只是1902年歐洲發生過的現象，中國的「未來」永遠慢歐洲一步。三、未來是單一的、直線式的時間發展，無法進一步想像未來各種不同的方向與變數。⁵³

姚建斌〈烏托邦小說：作為研究存在的藝術〉則是進一步將「未來」跟「現在」、「既在」作為一對比。此論文雖然不以晚清作為關注，不過其提出的時間概念恰好可跟以上兩篇論文形成一對話。論者認為作為一種本體性的精神衝動，「烏托邦」衝動內在於每個正常心智的個體，如上古的神話、傳說、祭祀禮儀、巫祝等皆可看作是烏托邦的初級載體。每一個社會、每一個個體、主體都附麗著烏托邦。烏托邦的內蘊的對話衝動：以「將在」反觀「現在」，又經由「現在」而追問「既在」，把過去、現在和未來這種三維時空拉入一個敞開的對話框架之中。此外，烏托邦時時刻刻昭示著現存的殘缺、混亂、無序，警醒著人們不要迷失了自我。烏托邦總是擔負著拯救靈魂、歷史、理性的使命。在人類的成長過程中，像槍林彈雨中勇猛向前的旗手，像茫茫無涯、波濤如山的大海中的燈塔，像氣勢磅礴、天然混成的樂隊的指揮……它永遠在導航，它永遠在照亮，它永遠在召喚、它永遠在前進。⁵⁴

論者亦論證此類小說與政治的意義。王德威〈賈寶玉坐潛水艇——晚清科幻小說新論〉從科幻角度論述晚清小說的烏托邦的空間意義，在表面的無稽之談外，其實深饒歷史文化意義，以反寫實的筆調，投射最現實的家國危機，而且直指一代中國人想像、言說未來世界的方向及局限。⁵⁵陳方〈論中國近代烏托邦小說的意義〉則是從思想脈絡指出近代中國既是中國人民苦難深重的時代，又是仁人志士改良圖治的時代。甲午戰爭的失敗，洋務運動的破產，刺激了有志之士對

⁵³ 王德威，〈混亂的視野——科幻奇譚〉，《被壓抑的現代性》（臺北：麥田，2003），頁387。

⁵⁴ 姚建斌，〈烏托邦小說：作為研究存在的藝術〉，《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頁105-114。

⁵⁵ 王德威，〈賈寶玉坐潛水艇——晚清科幻小說新論〉，《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臺北：麥田，1993），頁138。

社會改良的新認識。在西學新思想的召喚下，近代烏托邦小說提出建立資產階級國家政治體制的進步要求，為獲得社會廣泛響應他們尋求最有效的表達方式以實現其政治啓蒙。⁵⁶

就文類而言，歐陽健的系列研究又為我們揭開了「續書」作為研究對象的可能性。他在評《新石頭記》時討論了關於擬舊、翻新等概念，不同於阿英對於續書的批判，歐陽健肯定其「化舊為新」的思想內涵和藝術特徵。⁵⁷他對陸士諤的另一部「翻新小說」《新三國》則稱為：「作者對於民主、富強之路的探求的深邃和超前」。⁵⁸他更是從藝術形式的角度指稱這類小說的作用：「讓周瑜、孔明等穿戴古衣冠的人物，登上改革開放的新舞台，演出著亦古亦今、亦莊亦諧的話劇，以其對於晚清改革的『言皆有指，語無不新』的深沈思考和『局度謹嚴』、『氣勢蓬勃』的藝術樣式，而顯得尤有特色。」⁵⁹

筆者〈進出神仙島，想像烏托邦——論旅生《癡人說夢記》的空間想像〉以《癡人說夢記》為主要的分析對象，探討小說如何在「地理大發現」的衝擊下產生空間的變革。首先，本文從敘事中的父子的空間想像，論析傳統「仙人島」如何轉變到具有現代性視野的「鎮仙城」以及其意義；接著，論證新地理觀如何衝擊到小說的敘事，晚清後起的地理與政治概念如「五大洲說」、「國家」等進入了小說版圖，人物在逃亡時以天下為家，可是接著又很弔詭地發現天下無家，進而產生虛化的空間——烏托邦；本文進一步分析此虛化空間所展現的視野，科技與民主介入了此空間，成為往後五四「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先聲；最後，本文指出當烏托邦方案建構出來時，卻也一體兩面地步向反烏托邦的方向，自我消解了原初的理想性，出現創作動機與書寫結果的斷裂。⁶⁰

晚清以後，最常被論者以「烏托邦」論述的作家要屬沈從文、巴金與左翼書寫。這當中，彭小妍《超越寫實》是少數以「烏托邦」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專書。

⁵⁶ 陳方，〈論中國近代烏托邦小說的意義〉，《明清小說研究》1995年第2期，頁75-82。

⁵⁷ 歐陽健，〈晚清「翻新」小說綜論〉，《社會科學研究》1997年第5期，頁131-136。

⁵⁸ 歐陽健，〈陸士諤的奇想之一：三國的改革——《新三國》析評〉，《明清小說研究》1989年第1期，頁1。

⁵⁹ 歐陽健，〈對社會經濟改革的超前描摹——陸士諤《新水滸》析評〉，《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1期，頁81。

⁶⁰ 同註3。

她主要研究五四作品，指出五四的「烏托邦」有別於清末民主、民權意識高漲的烏托邦，「五四文學作品中反映的烏托邦意識，多半強調平民革命和階級鬥爭，所刻畫的理想中國藍圖，充滿平民革命和勞工階級得勢的遠景，無整府主義烏托邦的色彩濃厚。」⁶¹她研究沈從文苗族與鄉土故事中的烏托邦世界、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理念、茅盾《子夜》企業烏托邦的幻滅、《雷雨》如日中升的工人階級等。此外，作者認為現代文學的淵源可追溯到十九世紀的烏托邦社會主義、以及德國表現主義所鼓吹的革命觀，尤以法人聖西蒙、傅立葉、英人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影響深遠。此外，無政府主義的領導人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 1842-1921）對五四一代文人影響極大。由此，五四文學中蘊含的烏托邦訴求本質，是目前五四文學研究中的盲點。

這當中，可再關注的是三〇年代左翼書寫的研究。由於在政黨意識型態的介入下，大量製造特定的理想幻象，使得論者紛紛以「烏托邦」比附其理想視域。韓雪臨〈真實的與烏托邦的——簡論三十年代初左翼現實主義理論的話語機制〉指出在左翼文學史上，政治現代性與文學現代性之間的張力形成左翼文學發展的原動力，然而「真實性」與「主體性」作為現實主義的重要構成因素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始終處於悖離狀態，或者由於強調真實性而忽視現實主義的主體性，或者由於強調主體性而忽視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前者在政治正確的前提下言說現實主義的真實性，而後者進一步發展為文學創作中的「烏托邦」敘事。三十年代「左」傾權威話語對文學不斷滲透與介入，從而使左翼文壇的每一次理論調整都不斷偏離求真之路，在現實與浪漫之間搖蕩；⁶²王宏圖〈左翼都市敘事中的烏托邦詩學〉則是以丁玲（蔣冰之，1904-1986）、茅盾（沈德鴻，1896-1981）、曹禺（萬家寶，1910-1996）等左翼作家的都市敘事作品中為分析對象。這幾位作家的作品潛藏著一種啓示錄式的話語：否定現實世界，渴望建立一個人間的烏托邦。這一與現實世界對立的態度不僅使文本有別於新感覺派作家和張愛玲（張瑛，1920-1995），

⁶¹ 彭小妍，《超越寫實》（臺北：聯經，1993），頁2。

⁶² 韓雪臨，〈真實的與烏托邦的——簡論三十年代初左翼現實主義理論的話語機制〉，《浙江學刊》2001年第1期，頁70-75。

也使這些文本中個人的欲望趨於消失；⁶³劉紀蕙〈群的結合——三〇年代的烏托邦想像〉將烏托邦的討論帶到電影文本中，探討 1934 年上海聯華影業公司出產的《國風》與《大路》及郭沫若的詩作。她的論述策略乃是將三〇年代的「烏托邦」想像放到近法西斯式的層面上，進而提問：到底什麼是法西斯美學動力的政治形勢化與組織工程呢？為何文化場域中具有極權性格的論述會以物質與肉體的形式展現此組織化性格？由此，她討論組織集結動力與集體妄想症狀，及中國三〇年代整體文化場域與此妄想症狀相互制約的內在法西斯衝動，包括當時左右翼陣營的文藝政策、力行社，以及新生活運動。⁶⁴

以上各論者從文學、思想、社會領域進行的烏托邦研究，有諸多深入看法，提供了本論文思考的方向。《烏托邦思想史》使本論文得以瀏覽西方的烏托邦史，當中的《烏托邦》、《百年一覺》更是對中國晚清小說的烏托邦視野產生重大衝擊，恰可視為理論參照系。不過，若從晚清研究的角度評估，以上無論是從文學、思想、歷史角度切入的文章仍存在著需填補的空白點：晚清時人是如何接受烏托邦呢？「烏托邦」的詞彙如何進入時人的論述？這到底是「誰」的烏托邦呢？以上的文獻較少從時代語境考量「烏托邦」。最接近的要數張惠娟，透過具體的文本論析「樂園」與「烏托邦」的差別，並且歸納出晚清小說中的「烏托邦」視野。此外，彭小妍也很有自覺意識地指出五四文學受到聖西蒙、富利耶、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可是問題仍然沒解決：到底「烏托邦」此一字彙如何進入時人的視野呢？若將「烏托邦」視為一穩固的概念，然後再將分析的對象（如晚清小說、無政府主義、晚清社會等）比附，較難達到核心。事實上，此「烏托邦」的「本源」可能是一個指向無窮詮釋的中途點，不定於一尊，與時俱移。若是缺乏對此問題核心的掌控，將難於從時代語境把握所謂的晚清「烏托邦」，而是站在「我們」的角度來想像「晚清」的烏托邦，變成了是「我們」的烏托邦，而非「晚清」的烏托邦。因此，本論文不傾向於將「烏托邦」視為一至高無上統一體的理性化程式，

⁶³ 王宏圖，〈左翼都市敘事中的烏托邦詩學〉，《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4 期，頁 44-48。

⁶⁴ 劉紀蕙，〈群的結合——三〇年代的烏托邦想像〉，《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頁 201-231。

也非思想構成深處的基本範疇，而是在層層的「誤讀」下所形成的文化構成物。

此外，關於晚清小說的評論部分，由於評論視野集中在特定小說，如〈新中國未來記〉、《新石頭記》、《黃繡球》等，缺乏全盤性的搜索與觀察，較難建構理論的框架。因此，語境掌控與系統性研究，更顯重要。本論文的終極目標乃是建構出一個屬於晚清小說的「烏托邦」視野，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話語形構，晚清「烏托邦」的構成原則，必定跟中國傳統與西方的理想空間有關鍵性的價值差異，而其文學敘事的操作手法又更有獨特之處。本論文透過理論視野，追溯屬於晚清位置的「烏托邦」：晚清人如何想像理想視域？晚清如何透過敘事構築具有理想視域的空間方案？

六、論文結構：編譯／變異

「烏托邦」方案反映了處於歷史的和文化動盪和碰撞中的中國知識分子複雜的內心狀態，有諸多可切入的面向。本文採取編譯／變異的角度切入，主要考量到「烏托邦」是自西方傳入中國的概念，一旦經由晚清作者群翻譯與挪用，便涉及到「編譯」的問題。作者群「誤讀」與「編譯」各種中西關於理想境地的資源，融入時代語境，進而使得理想境地產生變異，確立起屬於晚清的烏托邦視野。如此的「編譯／變異」研究，牽涉到材料蒐集、詞彙翻譯、概念變調等問題。作為晚清新小說的研究，又進一步擴及敘事挪用的問題，必得考量此概念如何進入新小說文體？當中又牽引出文體、語言、作者、刊物等問題。在此連串因素的考量下，本文將詞彙考證、概念誤讀、材料蒐集、敘事探討等，分為兩大主軸作為論述的思考：一是如何「編譯」？一是如何「變異」？

論文第一章〈緒論：方法、範圍與回顧〉確立論文方向、交代研究背景與回顧相關評論各種。整體而言，本文希望透過翔實的材料、考證及理論思考的結合，呈現晚清小說中的「烏托邦」視野；第二章〈烏托邦：詞彙、新小說與文學史〉觀察晚清不同的論述位置（如知識分子、期刊、文化界）對於「希望」的呼喚。

在此一「希望」之音中，「烏托邦」是重要的一環，本文考察此名詞及概念的引進、翻譯與想像，透過不同的翻譯、詮釋、評述主體，分析晚清人士如何填補此一名詞及當中的演變軌跡。透過發掘、蒐集、精研大量的原始資料，本文追究晚清人士對於「烏托邦」的了解，進而將材料置入討論中：如「烏托邦」此一概念如何翻譯入晚清中國？而此一概念如被小說敘事挪用？而此類小說又跟晚清報刊、小說分類、作家群體有怎樣的關係？這類小說在晚清小說史的版圖又該有怎樣的位置呢？本文期望透過全面的材料梳理與探討，進而確立起晚清小說的「烏托邦」視野。

作為追尋理想社會的文本，各代綿延不斷，反映人類深層的心理結構。在中國近代，此一理想社會的表述方式如一競逐的空間，裝滿各種方案，在中西座標上召喚、挪用、變革、拒斥某些質素，成為一混雜的方案。論文第三章〈新編、譯編、轉編：「誤讀」桃源／未來／大同〉採取「誤讀」的概念切入，⁶⁵觀察小說作者群如何編譯各中西材料？本文的論述焦點集中於尤能顯現中西痕跡的小說「新編」、「譯編」與「轉編」現象，探討晚清小說的烏托邦視野如何參照這些來自中西方的資源？換言之，晚清小說中的烏托邦視野如何在續編／譯編／轉編的過程中確立？由於這當中涉及的資料諸多，我集中於三個面向：桃源、未來與大同。首先就傳統資源的新編而言，本文探討「桃源」此一符碼如何一再被作家群召喚，透過古／今、新／舊、傳統／現代、神話／現實之間的拉扯，新編出一套屬於晚清視野的「新桃源」。就西方的資源，廣學會出版的《百年一覺》（或是刊登於《萬國公報》的《回頭看記畧》）的「未來」敘述對於晚清小說的烏托邦視野帶來重大衝擊，從傳統的「理想過去」轉向了「放眼未來」。本文分析晚清作者群如何迎接此一「未來」敘事，挪用了《百年一覺》的什麼元素？而又忽略或放棄什麼元素？在此一迎棄之間，恰好凸顯晚清作者群對於譯作的取捨標準。

⁶⁵ 布魯姆 (Harold Bloom) 把一部文學影響史歸結為對前輩誤讀、誤解和修正主義的歷史，並非只是前輩對於後輩的傳授、支配、左右以及後學對於前輩的學習、模仿、繼承。他提出了一套程序實踐此「誤讀」理論，當中包括修正主義的辯證法、詩歌中的意象、修辭學的比喻、心理防禦、修改比率。以「詩歌中的想像」而言，「誤讀」的內涵包括在場與不在場、部分對整體或整體對部分、充滿和虛實、內部和外部的衍變。從「修辭學的比喻」而言，透過諷喻到提喻、隱喻到代喻等關係，尋找誤讀的痕跡。見 Harold Bloom, 'The Map of Misprison', *A Map of Misreadi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84.

最後，就思想界的資源轉編而言，本文先評估洪秀全與康有為如何誤讀儒家的「大同」資源，進而分析此一符碼如何建構出晚清小說的烏托邦視野？

確實，晚清作者群誤讀各中西資源，透過新編／譯編／轉編的方式確立起屬於晚清的「烏托邦」視野。本文第四章〈理論的框架：無地、異域、遍界〉便試圖替此一經由「編譯」而產生「變異」的理想視野建構出理論的框架：「無地、異域、遍界」。首先，就「無地」而言，作者先是塑造出現實層次的「無地可靠」的敘事，反映晚清現實層面的窘境與危機，亦呼應時人的「無家、無國、無史」之嘆。就在千鈞一髮之際，作者讓人物躍入烏托邦理論層次的「無地」，進入一虛構的完美「非在」的「沒有場所」；其次，就「異域」而言，人物經常飄洋過海，尋尋覓覓，闖入「沒有場所」的「非在」。當中夾雜著晚清新地理學的觀念，現代性的島嶼遊記使得人物風塵僕僕，穿梭國境，往來全球，於異域成功興邦建國，另起爐灶，完成「足遍五洲多異想」的「路漫漫路其修遠兮」；第三，就「遍界」而言，由於科技的介入，使得遍地都可成為烏托邦的可能，人物透過各種先進的交通進出世界，並且以超越的能力實踐「世界外之世界」的想像，甚至移民至星球與海洋，成就了「別尋世界」的敘事。當島嶼、月球、海底都可成為「世界外之世界」的框架，實重新詮釋了晚清文藝界的「他境界」理論，展現出新的文化意義，並且構築出晚清小說史的「遍地烏托邦」的視野。最後，晚清作家群的「上下而求索」有其積極的動力，可是在此一積極中亦充分展現其盲點，我將一一指出。

在混亂的時代視野中，烏托邦視野無法憑空而降，需經由一批具典範作用的人物衝鋒陷陣，振衰起敝。論文第五章〈模範群體的建構：烏托邦典範、身體與文明利器〉關注小說中人物群體的塑造，牽涉到群體身分的鑄造問題。事實上，晚清文化界湧現各種承載新價值體系的人物改造，包括新民、國民、軍國民乃至各種英雄豪傑的召喚與討論。在此一「模範生」製作的潮流中，新小說又如何捲入其中？本文透過各種小說的人物，探討當中涉及的模範轉換：從「血氣英雄」轉向「腦氣英雄」，出現各類政治家、發明家與國民之母，強調平等、自由、權利等概念。於此同時，晚清反映「身體」與「國體」互喻的視野，拯救身體往往

成爲思考國體之道，本文以洗心驗身、割髮斷指、強身健體等面向切入，探討作家群如何一再於人物的身體髮膚上大做文章，搬演「中國興亡夢」？作家群透過身體的各種切割操弄，棄除文化的卑賤，達到一種典範的作用。在此一身體的改造中，外在的社教機構亦積極介入，本文以日本政界犬養毅對梁啓超所稱的「文明三利器」切入，探討此三利器——學校、報紙、演說進入敘事及帶來的衝擊。當然小說未必亦步亦趨於思想界的「文明三利器」，卻在其基礎上，發展出特定敘事，甚至產生對應的概念，如會社（學校）、書籍（報章）、辯論（演說）。

本論文前面各章以「編譯／變異」的角度切入，探討理想視域如何因「編譯」的中介而產生「變異」的烏托邦視野。我欲進一步追問的是：到底，這些「變異」的圖景是由什麼來支撐呢？晚清小說作者群如何製造出「數千年未有變局」的「烏托邦」視野呢？若我們再重探前面各章的討論，便可發現此「編譯／變異」的圖景牽涉到新知識圖譜。於是，本論文第六章〈數千年（烏托邦）未有變局：「百科全書」式的視野〉對此有所回應。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不同於傳統的桃源仙鄉，「知識面」乃是一大差別。從內涵而言，晚清小說折射出來的「烏托邦」視野隱藏現代「知識類型」的視野，透過政治、科學、文學、教育、社會等各種論述企圖振衰起敝，形成鮮明的「近代之體」。當然，此小說反映的新知識非憑空而來，而是在西學東漸下，各種新知透過報章、期刊、翻譯、教育、演講、傳教等方式滲入，堪稱爲「百科全書」式的視野。就文藝界而言，可見到晚清作家群體與知識欲望之間的關係，各種文藝刊物與論著大力推動知識思潮，甚至編寫出百科全書。一旦新知識結構進入新小說，勢必影響到小說敘事，本文分成幾個層面，從小說中的夾敘夾議、答問結構、空間形式、續書新編等現象切入，分析作者如何嵌入各種知識，進而塑造出百科全書式的書寫，造成數千年（烏托邦）未有變局。

就上可見，「烏托邦」此一詞彙與概念在急切的改革渴望中，經由編譯的方式進入晚清中國的脈絡，並且成爲「希望」論述中的新的表達形式，促使中國的理想視域產生變異。作爲結論的最後一章〈編譯／變異：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將對此一「編譯／變異」的文學圖像進行總結。首先，本論文透過詞彙翻

譯、概念變調、敘事挪用等，從如何「編譯」到如何「變異」皆有探觸，全面性替此類小說建構出系統性的研究；其次，本文替各篇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作一總評，包括其中的書寫形式、內容以及代表性問題；第三，本文總結新小說的烏托邦方案的意義，指出其移植大量現代化的政治體制、科學技術、社會福利、文化教育、經濟體制等，參與了近代中國的現代性話語的推動；第四，本文從文學層面指出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經由「編譯」而產生「變異」，衝擊到文學的範式，改寫傳統的理想視域。最後，本文指出未來可繼續研究的線索，成為未結束的 Star Wars.

